



归国后的政治行动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得知这一消息后，流亡海外14年的梁启超激动不已，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于是决定回国，参与到民国的政治建设中。回国初期，梁启超对袁世凯抱有一定的幻想，认为袁世凯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力与威望，能够稳定民国初年混乱的政治局势，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因此，他积极支持袁世凯，为袁世凯出谋划策，甚至在1913年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在担任司法总长期间，梁启超试图按照西方的法治理念，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他主持起草了一系列法律草案，如《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法草案》等，推动了中国近代司法制度的初步建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世凯的独裁野心逐渐暴露出来。他公然破坏民主制度，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甚至积极筹备复辟帝制，妄图恢复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梁启超逐渐看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他深感失望与愤怒，毅然放弃了对袁世凯的支持，坚决站到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阵营中。

1915年，当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步伐，宣布恢复君主制、准备登基称帝时，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文中他深刻揭露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猛烈抨击其倒行逆施的行为，明确指出君主制不符合中国的时代潮流与人民意愿，坚定地表达了反对复辟、捍卫民主共和制度的立场。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重要舆论武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斗志。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积极联络各方反袁力量，暗中策动自己的学生——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起兵反袁。他为蔡锷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支持与战略建议，帮助蔡锷制定反袁计划。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发动“护国运动”，率先举起了讨伐袁世凯的大旗。随后，贵州、广西、广东等省份相继宣布独立，反袁浪潮席卷全国。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与护国运动的沉重打击下，袁世凯的帝制梦彻底破灭，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在绝望与恐惧中死去。护国运动的胜利，捍卫了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维护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制度，梁启超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1917年，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段祺瑞邀请梁启超出任内阁财政总长，梁启超再次投身政坛，希望能够借助段祺瑞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发展。在担任财政总长期间，梁启超积极致力于整顿国家财政，改革财政制度，试图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规范财政管理等方式，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为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他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改革方案，如整顿税收、发行国债、改革金融体系等。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局混乱，军阀势力各自为政，段祺瑞政府也主要致力于维护自身的军阀统治，对梁启超的财政改革方案并不真正支持，再加上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梁启超的财政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经历了多次政治挫折后，梁启超逐渐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中。五四运动期间，他坚决反对尊孔复古逆流，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倡导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晚年的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学，他凭借渊博的学识与独特的教学风格，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国学人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肾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56岁。他的一生，始终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己任，在政治、思想、教育、文学等多个领域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中国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



主办方：梁思益友突击队 主编老师：刘老师 2025年8月 第2期

个人介绍

梁启超，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先驱者。在政治领域，他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无畏的变革精神，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核心领袖，始终站在政治变革的前沿，为打破封建专制的桎梏、探索国家近代化道路奔走呼号；在思想界，他如一盏明灯，以笔为剑，用犀利且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将西方民主、民权等先进思想引入中国，深刻冲击着传统封建思想的根基，唤醒了无数国人的觉醒意识。

教育方面，他摒弃传统教育的僵化模式，无论是在时务学堂传道授业，还是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都始终以培养具备新思想、新视野的近代人才为己任，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史学领域，他提出“新史学”理念，主张史学应服务于社会变革与国民启蒙，打破了传统史学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局限，开创了近代史学研究的新范式。

文学上，他发起“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新文体”打破传统文学的束缚，为近代文学注入全新活力。

法学领域，他积极引介西方法律思想与制度，倡导法治精神，为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同时，作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始终以家国命运为己任，积极组织、参与各类社会运动，推动社会思想解放与进步。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杰出的词汇发明家，“政治”“经济”“科学”“民主”等众多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都经他传播与规范，融入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表达。

早年求学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一个书香世家，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他早年的求学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受家庭氛围熏陶，他自幼便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聪慧天赋。5岁时，在父亲梁宝瑛的悉心教导下，他开始诵读《四书》《五经》，那些晦涩难懂的古文，在他眼中却逐渐变得鲜活起来，小小年纪便能朗朗上口。9岁时，他已能独立撰写千字文章，其文字功底与逻辑思维远超同龄人，当地乡邻无不惊叹，“神童”的美誉也由此传开。

12岁那年，梁启超参加童子试，凭借扎实的学识与出色的文笔，成功考取秀才，成为当时新会县最年轻的秀才之一，一时间传为美谈。15岁时，他进入广州学海堂深造，学海堂作为当时广东最著名的书院，汇聚了众多学识渊博的名师与优秀学子。在这里，梁启超系统学习经史子集，深入钻研传统学术，其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县试、府试皆位列第一，进一步巩固了他“神童”的声望。

1891年，对梁启超而言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听闻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其思想新颖独到，对传统学术与社会现状有着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怀揣着强烈的求知欲与对新思想的向往，梁启超毅然前往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在万木草堂的学习时光里，康有为向他系统传授“托古改制”思想，引介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知识，彻底颠覆了梁启超以往对传统学术与社会的认知。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积极参与学堂的学术讨论与思想辩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维新变法理念。从此，他坚定地踏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与康有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时人将他们并称为“康梁”，成为近代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标志性人物组合。



公车上书与维新运动兴起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起初，许多国人仍对清军抱有希望，认为凭借“天朝上国”的底蕴，战胜日本并非难事。然而，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彻底打破了国人的幻想。1895年，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这一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哗然，悲愤之情弥漫全国。

此时，梁启超与康有为正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两人悲痛欲绝，深感国家危在旦夕。他们深知，若不采取行动，中国将面临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连夜起草《上今上皇帝书》，在书中，他们痛陈《马关条约》的危害，强烈反对割地、赔款，明确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张，呼吁光绪帝进行全面变法，以挽救国家危亡。

为了让这份上书能够引起光绪帝的重视，梁启超与康有为四处奔走，联络在京应试的举人。他们在会馆、客栈等地向举人们宣讲国家面临的危机与变法的紧迫性，许多举人深受触动，纷纷表示愿意签名支持。最终，共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在《上今上皇帝书》上签名，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公车”便成为举人的代称）。

尽管“公车上书”因守旧势力的百般阻挠，最终未能送达光绪帝手中，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却极为重大。这次上书不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首次以大规模群体行动的形式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更重要的是，康梁二人通过这次行动，广泛宣扬了维新变法思想，让“变法”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为后续维新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标志着中国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正式拉开序幕。

宣传维新与时务学堂讲学

1895年8月，在“公车上书”的影响下，维新思想逐渐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为了进一步扩大维新思想的传播范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后因重名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凭借出色的文笔与深厚的维新思想底蕴，成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情况，对比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深刻剖析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呼吁朝廷进行变法革新。《中外纪闻》每期印刷一千余份，免费分发给在京的官员与士大夫，虽然发行量不大，但在官员群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维新思想在统治阶层内部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又积极筹备，参与起草《强学会序》，发起成立强学会。强学会以“研习西学，交流变法思想”为宗旨，吸引了众多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士大夫与知识分子加入，如文廷式、翁同龢等，成为当时维新派的重要政治团体。强学会定期举办演讲、讨论活动，传播维新思想，推动变法舆论的形成。然而，强学会的活动引起了守旧派官员的强烈不满与抵制，他们污蔑强学会“蛊惑人心，图谋不轨”，向慈禧太后进谗言。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强学会被迫解散，《中外纪闻》也随之停刊。

但维新派并未因此气馁。1896年8月，梁启超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了《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全面负责报纸的编辑与撰稿工作。在《时务报》上，梁启超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五十余篇文章，系统阐述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与主张。在《变法通议》中，他明确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著名论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他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下君权过度集中、民权缺失的弊端，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呼吁赋予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开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同时，他还又在文章中大力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时务报》的文章语言通俗易懂、激情澎湃，摒弃了传统文人晦涩难懂的文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报纸发行后，销量迅速增长，数月间便达到万余份，“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上至朝廷官员、士大夫，下至普通知识分子、市民，都争相阅读，成为当时传播维新思想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极大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

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梁启超前往长沙，担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阵地，旨在培养具有维新思想与近代知识的新型人才。在学堂任教期间，梁启超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与同事共同制订了《时务学堂学约》，明确将“培养维新思想与爱国精神”作为核心教学目标。他打破传统私塾“死读经书”的教学模式，在课堂上不仅向学生传授儒家经典知识，更系统传播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与西方政治学说，如卢梭的“天赋人权”、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等。为了启发学生对封建统治的批判意识，他还特意让学生阅读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著作《明夷待访录》、揭露清军入关暴行的禁书《扬州十日记》等。

在梁启超的悉心教导与影响下，时务学堂的学生思想日趋激进，他们积极探索国家前途与社会变革，甚至提出“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的大胆观点，彻底突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尽管梁启超的教学活动遭到了湖南当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与打击，他们污蔑时务学堂“败坏风气，蛊惑青年”，要求取缔学堂，但时务学堂仍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蔡锷、范源濂、李复几等。这些学生后来在不同领域为中国近代革命、



戊戌变法的起伏

1898年初，随着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与维新运动的不断发展，变法的时机逐渐成熟。梁启超前往北京，积极参与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活动。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保护中华民族、维护孔子圣教。保国会定期召开会议，发表演讲，呼吁朝廷尽快实行变法，挽救国家危亡。保国会的成立，标志着维新派开始形成具有一定组织性的政治团体，具备了近代政党的雏形，为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进行了早期探索。保国会的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吸引了众多爱国志士的加入，但也遭到了守旧派的疯狂攻击，他们指责保国会“名为保国，实则乱国”，要求解散保国会。

随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积极推动下，光绪帝终于下定决心实行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因1898年为农历戊戌年而得名）。《定国是诏》明确提出了变法的基本方向，主张学习西方，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制度。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多次召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听取他们的变法建议，并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7月3日，光绪帝破例召见梁启超，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按照清朝惯例，非进士出身者不得被皇帝召见，而梁启超当时仅为举人身份。在召见过程中，梁启超向光绪帝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并进呈了《变法通议》。光绪帝对梁启超的才华与变法思想极为赞赏，当即赏其六品顶戴，任命他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期间创办的重要新式学堂，旨在培养具有近代知识与技能的新型人才，而译书局则负责翻译西方书籍，为变法提供理论与知识支持。梁启超上任后，积极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书籍，为变法运动引入了更多的西方先进思想与制度借鉴。

然而，戊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切身利益，他们对变法诏令百般抵制，暗中策划推翻变法。随着维新派与光绪帝推行的新政不断深入，守旧势力的反扑也日益激烈。慈禧太后暗中联络荣禄、袁世凯等守旧官员，准备发动政变，再次实行训政，废除变法诏令。

光绪帝得知慈禧太后的阴谋后，心急如焚，他深知自己手中没有实权，无法与守旧势力抗衡，于是试图依靠袁世凯来摆脱慈禧太后的掌控。袁世凯当时担任直隶按察使，掌握着一定的兵权，且表面上对维新变法表示支持。光绪帝秘密召见袁世凯，授予他侍郎衔，希望他能够出兵保护自己，镇压守旧势力的政变阴谋。然而，袁世凯是一个极其狡猾的投机分子，他深知守旧势力实力强大，维新派难以取胜，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他在接到光绪帝的密令后，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与维新派。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宣布再次实行训政，废除了戊戌变法期间颁布的所有变法诏令。随后，慈禧太后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外国友人的帮助下，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位维新志士被捕，最终英勇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历时仅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故又称“百日维新”。



流亡海外与继续改良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历经艰险，最终流亡到日本。尽管身处异国他乡，面临着重重困难与压力，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维新理想，依然坚定地致力于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

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1898年12月创刊）与《新民丛报》（1902年2月创刊）。《清议报》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主要刊登评论文章、新闻报道、译著等，猛烈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腐朽统治，歌颂光绪帝的变法之举，呼吁恢复光绪帝的权力，继续推行变法。《清议报》的文章观点鲜明，语言犀利，在海外华人与留学生群体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发行量最高时达到数千份。

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后，梁启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该报的编辑与撰稿中。与《清议报》相比，《新民丛报》的内容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成熟。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如《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在这些文章中，他不再仅仅局限于抨击守旧势力与呼吁恢复光绪帝权力，而是开始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深刻剖析，指出中国国民存在的“奴性”“愚昧”“保守”等弊端，强调培养“新民”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实现中国的政治变革与国家富强，首先必须改造国民性，培养具有独立人格、民主意识、爱国精神与科学素养的“新民”。同时，他还在文章中进一步宣传民权思想，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详细阐述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架构、运作机制与优势，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更加系统、具体的理论规划。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思想深刻，文笔流畅，兼具理论性与可读性，对当时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许多留学生与国内的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新民丛报》，接受了维新改良思想与民权观念，开始反思中国的社会现状与政治制度，为后来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新民丛报》也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两万余份，远销海内外华人聚居区。

除了创办报刊宣传改良思想外，梁启超还积极与海外华人、留学生群体交流互动，参加各类学术与政治活动，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还翻译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如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当时译为《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当时译为《法意》）等，将西方先进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思想引入中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宝库。